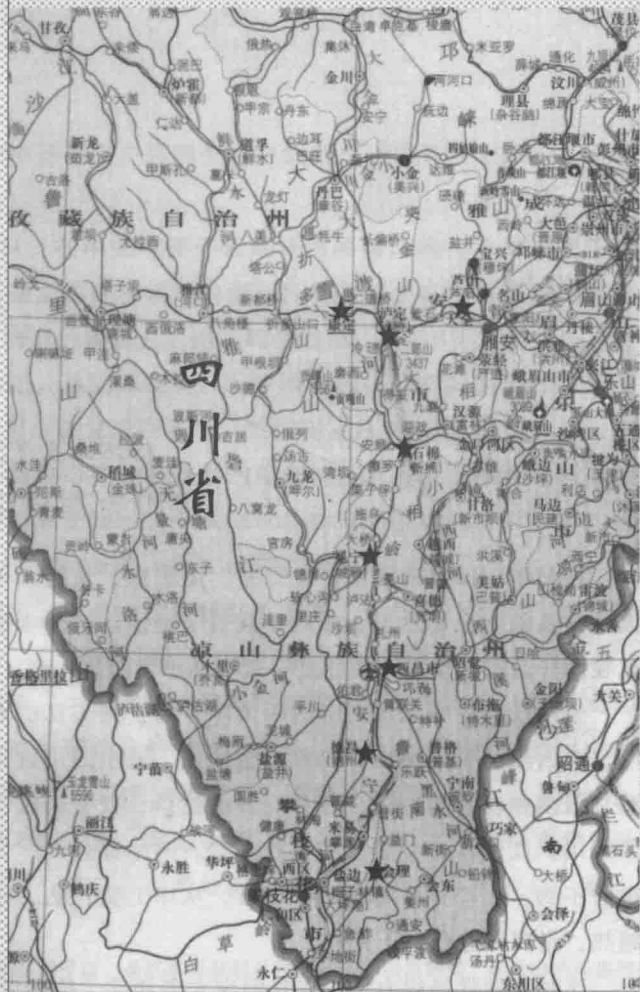




四川省

1985年5月3日—1985年5月31日

会理县 德昌县 西昌县 冕宁县 石棉县 泸定县

1985年5月3日 晴

四川会理县中武村



1935年5月3日拂晓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干部团第四营营长韦国清一道乘一只小木船，从皎平渡过了金沙江。50年后的同一天清晨，我也在同一渡口过了江，乘的是一只机动小渡船。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是长江的上游。长江发源于青海，在西藏、云南境内，均称为金沙江，流至四川宜宾后始称长江。皎平渡是云南禄劝县与四川会理县交界的渡口，我今天过了渡，就从云南进入了四川。江面水流湍急，约300米宽。两岸都是山，但看不到树木，连草也看不到，大都是沙砾，间有岩石。从岸上到江边，走了4个小时，越走越热，走到江边已口干舌燥。

这时我顿觉筋疲力尽，向导们也大多如此。他们说这里的气候有点怪：5月的天气很凉爽，在岸上，中午还要穿毛衣；但越往江边走越热，而热又热不出汗。我们剥得只剩下一件汗衫，还是热得想剥。是气压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心里只觉得烦，感到有点渴，但又喝不下水。这时，我忽然想起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记载，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五月渡泸”说的就是这里。金沙江古称泸水，“不毛”不就是连草也不长的地方么？我想，蜀国战将马岱的兵士涉水2000人，据说中毒死了1500人，看来不一定是被水毒死的，很可能是因为气候太恶劣的缘故。过了江，就觉得胸口舒服多了。个中原因，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也许会有人来弄清的。

从目前我掌握的一些材料来看，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共分三路、四个主要渡口。而从行军现场和人们目前较一致的说法来看，又主要是两路和两个渡口。但分三路、四个渡口说法的确有根据，当时只是由于江水上涨、

水急浪大、浮桥被冲垮等原因，另两个渡口分别只过去了一个红十三团和一个医院。

1935年4月29日，在中央军委于云南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的当晚，毛泽东亲自对部队过金沙江作了部署，当时的确是分三路、四个渡口：

第一路是红九军团。他们原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迂回云南去四川。在完成任后，他们于4月25日从贵州盘县的江上村进入云南富源县的龙口场和沾益县的乐利村。本可以三四天时间追上主力红军，后接到中央军委指示，令其继续单独行动，遂从主力红军的东北侧翼牵制追敌，经宣威、会泽，由东川的树桔渡过金沙江。

第二路是红一军团，在中央军委纵队左侧翼。他们派少量部队佯攻昆明，连克禄劝、武定、元谋等县城后，向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龙街渡疾进。

第三路是红三军团、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和殿后的红五军团。到禄劝县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由禄劝县的九龙经中屏、撒营盘，到洪门渡（也称驿江渡）；另一路由禄劝县的九龙，经翠华、团街，去皎平渡。

皎平渡南距昆明400多里，北距会理140多里。距这个渡口东约5里多的洪门厂村，也有一个渡口。这两处都不是通向四川的主要渡口，敌人

皎平渡至通安之间的隘口狮子山，是红军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山高路险，5月份的炎热气候爬此山实有“火焰山”之感。图为作者在狮子山上。（李应权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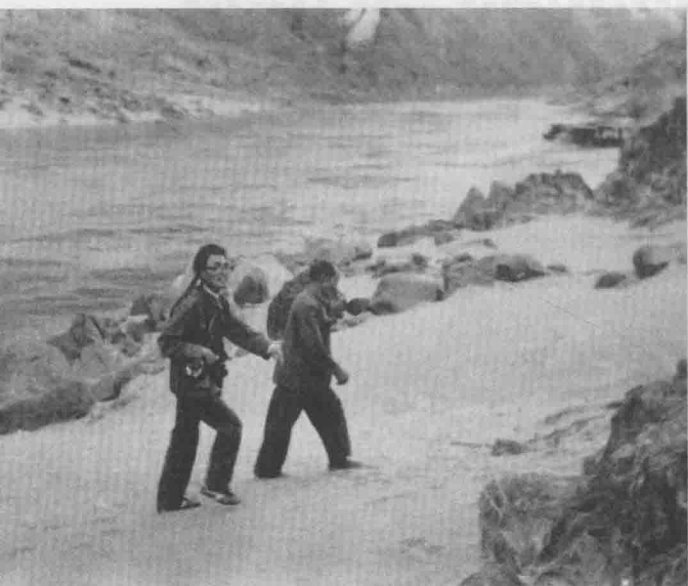
防守薄弱。第三路中的红三军团当时曾赶到洪门渡后架了浮桥。后因晚上江水上涨，水急浪大，浮桥被冲垮。幸好军委干部团抢先控制了皎平渡。

干部团第二营是夺取皎平渡的先遣支队，该营第五连担任前卫连。在该连到达皎平渡口前，敌人已在金沙江几百里的防线上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而且把全部渡船掠到北岸。皎平渡北岸是川敌驻防，为了探查情况，敌人不断派便衣过江。5月1日黄昏时刻，红五连的先头部队在连长肖应棠率领下到达皎平渡口，见江边停着一只船。经打听得知，原来这是川军探子划过来的，此时人不知跑哪里去了，船和船夫遂被红军俘获。

第三路兵分两路，原定在两个渡口过江的计划没有能完全实现：洪门渡只过去了红三军团的一个团，即十三团，其他的都是在皎平渡过的江。

第二路是红一军团，原定在中央军委纵队左侧80多里的川滇主要渡口龙街渡过江的计划也因情况有变，未能实现。最后除一个野战医院在一个名叫绞车渡的地方过江，其余的部队也都是在皎平渡过的江。

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又想弄清下一个问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过了江后，为什么停留在江边的山洞里，坚持指挥了三天三夜才离开呢？过去我在书上见到过“巧渡金沙江”的说法，看来这个“巧”字大有文章。



◀1935年5月3日，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中央机关在皎平渡渡口过江。作者也于50年后的同一天和当年帮助红军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右一）一起上岸。（李应权摄）

1985年5月4日 晴



会理县通安镇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四川的第一天，不得不使我们回忆起古人的诗句。这是曾担任中央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在回忆长征时写下的感慨。当年红军告别云南禄劝县，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攀登会理中武山，夜宿通安镇。这里就是莫文骅想起古人诗句的地方。

50年后的今天，我攀越的也是这条路线。莫文骅在回忆长征所写的《五一的前后》一文中，对这条山道的艰险是这样描述的：“瞧，闪电形的石山路只可容一人，曲折盘旋，崎岖险恶。”他们当时为了抢登山顶，以免被敌人先机占领，虽“用了十分的劲向上爬”，也花了近3个小时。而我今天是咬紧牙关向上爬，竟用了近4个小时。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只容一人，曲折盘旋”，而是路太陡，简直就是挂在砂砾石崖上。不少地段是75度左右的陡坡，个别地段甚至是垂直的，叫人发晕。碰到这种路段，我更觉体力不济，精神不振。要不是四川同志的帮助，我很难爬上去。这使我忽然想起了今早川滇两省为我交接的情景。

到了四川，我就要和云南的同志告别了。当云南禄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纳思颐一行陪我过了江，到了中武村，把我交给四川会理县的同志时，会理县的领导和向导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他们问纳主任：“这位就是罗记者？”纳主任点着头说：“是啊。”停了一会儿，纳主任似乎悟到了什么，连忙说：“你们看他已瘦得没有人样了吧？他的工作太辛苦了，得每天走，每天写，只好请四川同志多关照，多操心了。”

四川的同志对我确实很关照：今天爬山，我身上只带了照相机和军用水壶，其他物品都由他们分担了。爬到陡壁处，江中涌起的旋风把我们的衣服刮得呼呼响，会理县委宣传部长郭昌祯就提议，让我腰间系根绳子。我明白他的意思：此刻我虽被捆在可容一人攀登的石路中间，但他仍不放心，怕我体力不支，站不稳，被旋风刮下去。说实话我心里这时也觉得有点发虚，但想到他们这么真诚，又是头一天同他们行走，无论从情感上还是面子上来讲，我都应当坚强，所以我咬紧牙关谢绝了。

好不容易登上了中武山顶，再望金沙江，只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了，从江底上来的小路也成了一条弯弯的细线。在“飘带”的北岸，有一排在

砾崖石壁上开凿成的山洞，这时虽然已隐约在江雾中难于看清，但其状其貌在我心中已格外清晰。

今晨，我在离开金沙江边的中武村时，专程去看了这排山洞。一进去，顿觉阴暗潮湿，异味冲鼻。据说这排山洞是过江的百姓多少年来不间断且自发挖成的。像样的山洞有5个，最大的约10平方米，小的六七平方米。当年中央红军渡江指挥部就设在这些山洞里。毛泽东住在西边水流方向的第一个洞子，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蔡树藩等分别住在东边的几个山洞内。

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16日傍晚渡过江西于都河开始长征以来，突破的大江大河有潇水、清水江、湘江、赤水、北盘江和乌江等。不论哪一次，



▲毛泽东曾在金沙江皎平渡口的这个山洞（左一）里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李应权摄）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在金沙江边指挥渡江和住宿的山洞。（李应权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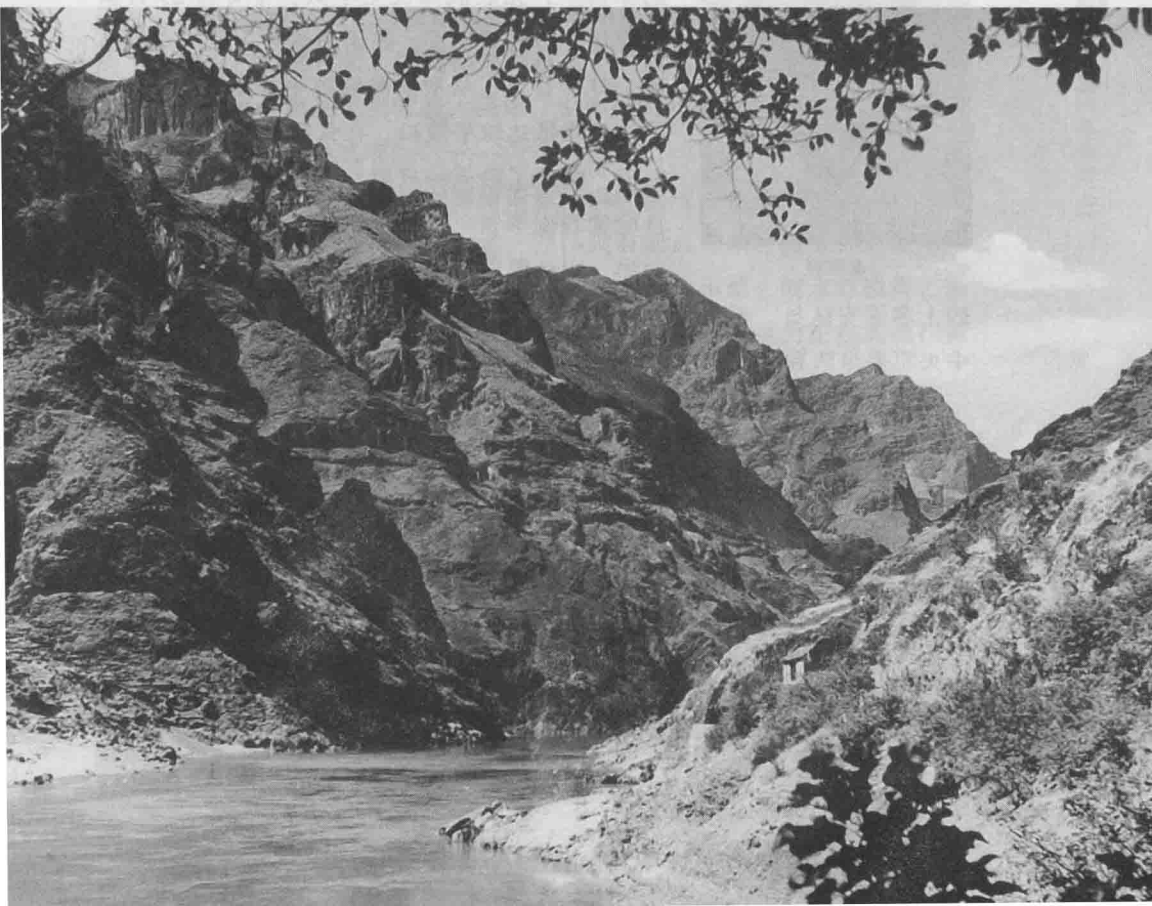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过了河以后，都立即随主力急速行军，从不在江边停留的。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5月3日凌晨过了金沙江后，直到5日上午，还停留在山洞里，与作战部门的孔石泉、王辉、吕黎平等研究战况并指挥渡江呢？这几天我从在云南、四川的采访中找到了答案：当时情况万分危急，中央军委纵队虽然靠几条小船陆续登上北岸，但中央红军的大部分仍在南岸。尤其严重的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从5月4日深夜起已同中央失去联系。按计划，他们此时应已奔袭到皎平渡西近百里外的龙街渡，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因江水太急，架设的浮桥被冲垮，渡江也受阻；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殿后部队

红五军团，此时还正在南岸的禄劝石板河与尾追之敌激战；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离得更远，正离开云南的东川，边打边走，向金沙江桔树渡口奔袭。

红军长征以来，打得蒋介石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老蒋此时已自感无颜，唯一还能吹牛的，就是把红军阻隔在长江南岸。如果红军过了金沙江，不仅会使他丢尽脸面，也会使红军赢得战略主动权，这是蒋介石绝对不想看到的。所以蒋介石调动了当时在川、黔、滇能调动的所有部队，共计20多万人正向金沙江全力围堵，妄图阻止红军渡江。此时对红军来说，时间就是胜利，指挥得当，就是红军的生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危急关头，决定停留在金沙江北岸山洞里，目的就是指挥红军胜利渡江，转危为安。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究竟是怎样指挥部队渡江、使中央红军脱离险境的？这又成为我了解的一个问题。时间不早，只好明天再记。

▼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主要渡口——皎平渡全景。（李应权摄）



1985年5月5日 晴

会理县彰冠乡



今天傍晚走到彰冠乡。

彰冠乡是一个小集市，街上除了四五家小烟摊，只有五六家小食摊还亮着灯。今天忘了买烟，凌晨一点半时，抽完了最后一支烟。我估计街上肯定找不着开门的小店了，只好苦熬着。那种难受的滋味只有自己清楚。

我找了盆冷水，抹了一把脸，又抓了一把茶叶，边嚼边稳定情绪，开始写昨晚没有写完的日记。

前些天，我的日记里已写到，中央红军原计划是从桔树渡、龙街渡、洪门渡（也称驿江渡）、皎平渡四个渡口过江。



▲陈赓

夺取皎平渡的先遣任务是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该团第二营是夺取皎平渡的先遣支队，二营第五连是前卫连。前卫连在连长肖应棠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于4月29日从云南禄丰的柯渡出发，在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山路上，日行百里，从敌人的缝隙中穿插过去，于5月1日夜抵达皎平渡口。在张朝寿等三位船工帮助下，缴获了敌人一只船，又捞起一只船。连长肖应棠当夜率领一、二排战士，分乘两只船渡到对岸，用计俘虏了守渡口的川敌一个正规连和三十

四十名保安队员。干部团后续部队乘胜追击，控制了渡口，夺取通安，为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北渡金沙江铺平了道路。

当军委纵队从皎平渡过江的时候，军委获悉红一、二军团在龙街渡和洪门渡过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立即电令一、三军团改从皎平渡过江。

这一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此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压向金沙江两岸，我军必须争取时间。但渡江时遇到的困难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难题是两个：一是船只不够，到5月3日止还只有两只小船，每船每次只能渡15人左右。当时除红九军团远在桔树渡过江外，红一、三、五共3个军团2万多人都将从皎平渡过江，仅靠这两只小船，肯定会延误时间，必须迅速找船工寻船；即使找到了更多的船，但由于空中有敌机轰炸，要是组织不严密，

敌人击我于半渡之中，损失将不堪设想。为此，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毛泽东渡江过河后第一次停留下来，亲自指挥。

5月3日，我在江边见到了50年前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的两名船工：72岁的张朝满和74岁的陈月清，他们身板清瘦而硬朗。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红军先后找到7只渡船和36位汉、彝、傣族船工，分成两班，人歇船不歇，日夜抢渡。我问他俩，当时是否知道山洞里住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他们都说：哪个晓得！我们只顾划船，人息船不息，到下班，累得只想躺下，身子刚挨着地，就睡死了。不过张朝满告诉我：那时船工心中也都有数，晓得那些个山洞里有能人，了不得。我们船工当时有两个发愁：一是部队那么多人，要是抢着上船，非把船搞翻不可；二是坐骑和运弹药、粮食的马匹多，船小，经不起马匹又蹦又跳。张朝满像故意卖关子似的问我：“你格晓得最后是怎么对付的？”我摇了摇头，请他讲。张朝满不无自豪地说：“就是因为山洞里那些人指挥得好，谁上船，谁不许上；谁看天上的飞机，谁搞地上的搬运，都听山洞里的指挥，一点不乱。”他告诉我，骡、马过江的困难也是山洞里来了一个命令，就全部解决了：把它们赶到水里，缰绳拴在船帮上。人从船上过，骡、马跟着船洒水过去，这办法解决了当时的大问题，也让我们开了眼，50年来，大牲口过江我们还用这个办法哩。

今天我才基本搞清：红三军团奉命从洪门渡过江，以第十三团为前卫去夺船只，架浮桥。后因水流太急，浮桥没有架成就被冲毁了；而船只则早被敌人收走或凿沉，费了很大的劲，只找到一只小船。因水急浪高，费了好多时间，只过去了一个十三团，而这时红三军团的主力正在向洪门渡



◀帮助红军巧
渡金沙江的老
船工张朝满。



▲当年帮助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老船工张朝满在介绍红军渡江的情景。（罗开富摄）

全速前进。军委得悉这个情况，急令红三军团第十一团由后卫改为前卫，赶往皎平渡过江。

红一军团虽然夺取了远在元谋县的大渡口龙街，但因找不到渡船，而江面又太宽，架桥器材一时难找，况且两岸山势平缓，敌机不断骚扰，即便找到器材架桥的难度也较大。因此，军委也命他们火速赶往皎平渡过江。由于军情紧急，红一军团还未译完电报，更来不及回电，就出发了。这可急坏了正在山洞里指挥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他们急命已从皎平渡过江的红十一团轻装出发，沿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西进，寻找红一军团。在张爱萍带领下，红十一团冒着大雨走了大半夜，终于见到对岸的一长串火把，经判断，确定是红一军团的部队。由于江面太宽，江水奔腾，雨又下得大，相互之间无法通话。只好集中全团的司号员一起吹号、再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要他们“务必不顾疲劳”迅即赶往皎平渡过江的命令传达过去。

就这样，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中央军委纵队和3个军团依靠7只小船，从5月1日起到9日中午止，不漏一人一马，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红九军团也于5月7日从桔树渡全部过了江。

两天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江边，但我军已经毁船封江，无影无踪了。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红军一过金沙江，云南军阀龙云大大松了口气：只要红军不攻昆明，不留云南，就是天大的喜事。但龙云又深恐蒋介石



1985年5月6日 晴

会理铁厂村

石降罪于己，为了开脱责任，取巧卖乖，于红军渡江完毕的5月9日夜里致电蒋介石：“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发出电报后，龙云想到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还是恐慌不已，就又赶紧以作战不力的名义，处死了几个县长“以谢党国”，为自己开脱责任。四川军阀也学龙云，逮捕了江防大队长汪保澄。

今早告别彰冠乡，经南阁，走60里到了会理县城，稍休息，又走十多里，到达城郊的铁厂。

会理，是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的第一个县，铁厂是个地名。今天我一直在琢磨两个问题：一是红军从1935年5月8日开始包围会理城，5月16日主动撤离。我想，在7天7夜的攻城战中，红军为什么不把会理城打下来？是围而不攻，还是别有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铁厂的。铁厂是个大地名，包括好几个村子。1935年5月12日，党中央在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从资料上得知，中央红军虽然过了江，但处境仍然危急：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5月12日急急飞到昆明，就近调动军队，继续围追堵截红军，还派飞机到会理上空盘旋侦察。红军为什么不马上前进，却要停下来休整呢？党中央又为什么急着开会呢？

今夜我先记述第一个问题。

会理地处四川最南端，北距成都一千多里，今属凉山州。县城二万多人，六七条大街。会理市面很繁华，是我自离开遵义以来见到的最有生气的县城：店铺挤满了每条街道，有的小店门口，辣椒、柿子、蒜头等一串一串，从屋檐直挂到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穿得十分整洁，给人以勤劳、质朴的印象。据介绍，50年前的会理只有一条直街，两条横街，三千多人口。据当年云南日报1935年7月9日的一条消息记述，会理“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风餐露宿，目击心伤”。川敌旅长刘元塘的“婴城固守”的政策，更会使理遭受了一场浩劫。

红军干部团第五连在肖应棠连长率领下，5月1日深夜最先渡过金沙江，

随后干部团陆续过江。5月3日，部队继续北进，击溃阻敌刘元塘部，占领通安，经爱民、彰冠，抵达会理城郊。继而红三军团过江，以同样路线赶到会理，接替干部团，包围会理县城。红一军团继红三军团之后也到了会理，但未停留，继续北进。红五军团在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和红一、三军团渡江时，一直在江南岸的云南禄劝石板河一线以一当十地顽强阻敌。胜利完成掩护任务后，他们及时甩脱了追敌，于5月9日过了江，继续担任殿后任务。

会理当时是敌川康边防军第一旅旅部所在地，旅长刘元塘。该旅一部在金沙江边中武村阻挡红军过江，惨遭失败，退守通安。刘元塘率部驰援通安，也告失败，伙同残兵逃回城里。刘一边急调外围各部进城死守，并电请驻西昌的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火速派兵增援，一边以“婴城固守”为借口，把城外百姓的粮食、油料、柴火等搜刮一空，然后紧闭城门不出。为了清扫射界，防止红军接近城垣，刘元塘下令用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引火物，抛到城外居民房上，把民房全部烧光。两个月后，当时的云南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现场，发出了“大肆焚刮，惨无人道”的感叹。

因此，当年会理的攻城之战打得异常激烈：在红三军团攻打会理的7天7夜中，第七团负责围城，第十一团负责攻打东城门，第十二团负责攻打西城门。5月10日晚，红军炸塌了西北角一段城墙；5月14日，又将东门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据记载，在西北角城墙被炸塌时，敌旅长刘元塘的老脸

▼作者在四川会理县老街乡彭德怀曾居住过的旧址采访。



也被炸伤；在另一处，敌团长聂秋涵被我军的弹片击中胯部，“两眼翻白，差一点断气”。红军之勇，战斗之烈，可见一斑。

但红军始终没有攻进城去，究其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佯攻”。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从我近200天的踏访来看，红军佯攻贵阳、昆明及一些县城时，都不是这么个战法，大都是远在城郊30里左右的地方大造声势，将主力部队隐蔽起来，用一支或几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很少交火，顶多是放几枪、掷几个手榴弹震慑敌人。而在攻打会理中，动用的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红三军团，5月12日，周恩来还亲自布置工兵挖地道炸开北门城墙；遵义会议后，李德靠边站了，伍修权担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5月14日，伍修权和作战科长李天佑亲临第一线，检查督促地道作业并组织爆破。但由于炸药不足，加上守敌挖沟灌水，城墙没有炸倒，攻城受挫。5月16日，我军撤围北上。



▲伍修权

会理攻城之战，说佯攻不像，但说真攻也不完全像，尽管当时红军已是疲惫之师，但若真要下决心，攻下会理城还是不成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今天在偶然之中找到了答案。

说在偶然之中，是因为我无意间看到了会理县委党史办的一份资料。1974年1月9日，会理县委的同志为了核实党史问题，到北京找到当年攻城的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和政治部主任王平。他们回忆说：攻会理是为了迫使敌人龟缩在城里，掩护红军大部队在城郊休整；会理不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从城边绕一下，同样可以北上，之所以猛烈攻城，是要给敌人以错觉，以为红军过了江后，要在这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就可把敌兵吸引到会理一线来，我军就可乘北边敌人空虚，北上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时，我军也想攻下会理，补充当时奇缺的衣服、粮食等。

战无定法。用佯攻，或用真攻来解释会理之战，都不准确。写到这里，我有两点感想：一是时间越久，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情况越难弄清。如果总等着后人来研讨，免不了把简单的问题越弄越复杂，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二是毛泽东不愧是军事战略大家，亦佯亦真，可进可退，听凭自然，挥洒自如。

1985年5月7日 晴

会理城



会理铁厂包括姚家村、赵家湾子等村子，因这些村子历史上都办过铁厂，就把几个村子统称为铁厂。据史料记载，党中央当年曾在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是1935年5月12日下午至深夜。

会理境内平坝不多，大多是山梁子，铁厂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当年的会理会议旧址已很难确认，因为这一带已建成蓄水量很大的红旗水库，许多村子被淹没了。姚家湾子还在，村子一片白墙黛瓦，依山傍水，掩映在树丛中。当年军委电台就设在村里陈海清家，这已被党史专家确定。至于会理会议在哪一家召开，至今还未确认。不过我想，军委的电台既设在这个村里，开会的地方一般也不会太远，不一定是在被水库淹没的村庄里。这只是推测，还需实证。

▼会理县铁厂村。原红军开会的铁厂村已沉入水库，这是后建的，但四周环境依旧。（李应权摄）



据史料记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李德也列席了会议。在现代史料编刊社1982年12月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李德（奥托·布劳恩）写道：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五月中旬在会理附近匆匆忙忙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在最后一刻被邀请去了”。

对于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原因，我在今天参观《红军长征过会理》史料展览后基本弄清了：我军渡过了金沙江，才算真正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但是敌情仍然严重，需要进一步确定新的行动方针。同时，从1935年1月28日开始四渡赤水以来，党和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战略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和意见，需要统一认识，以团结一致，克服面临的严重局势，开创新局面。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体现了大多数党员和战士们的意愿，但有两个人却很不服气：一个是凯丰（何克全），他在遵义会议上狂妄地质问毛泽东：“你知道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问得凯丰（何克全）哑口无言。



▲凯丰（何克全）

另一个是林彪，在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的千里转战中，林彪一直牢骚不断。他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为了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还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反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战略。

我从一些史料上分析：林彪的这封信是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写的，但直到会理会议上，才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地位。

《彭德怀自述》一书谈到：“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是更不适当。”

毛泽东也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

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于1971年9月13日乘机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种结局，与他在长征中的思想表现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的事，毛泽东后来也知道了。但彭德怀自认光明磊落，一直以为这是林彪的错误，与己无关。没想到在24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旧事重提，并把彭德怀牵扯进去了。

会理会议的意义十分重要：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方针，同时通过批评林彪的错误，统一了认识，对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林彪够奸猾的，他的真实目的是要毛泽东下台，这种心思在长征路上就暴露无遗了。但后来林彪却又一直被毛泽东信任了36年，看来世上最难的事，乃为识人。

▼红军曾经过的四川会理的一个农贸市场。（罗开富摄）



1985年5月8日 晴

会理龙肘山



四川省

1985年5月3日-1985年5月31日

今天走的路不多，时间较宽裕，我就琢磨起地图来了。这是我的一大爱好。我发觉四川很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以成都为中心，川西和川东恰似展开的两翅，正用力飞腾；蝴蝶的尾部就是会理县，它是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的第一个县；而蝴蝶的头部正是包座、巴西，它是党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走出四川的最后一个地方。

蝴蝶是美丽而聪明的。进入会理5天来，四川人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今天我的宿营地龙肘山，就是四川的一个缩影。

在会理的群山之中，龙肘山只算是一座普通的山，但她同样养育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里的老百姓再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就在山上办起了砖瓦厂，赚了点钱后，又在砖瓦厂的基础上，利用山上的原料，于1983年初办起了会理县美术玻璃厂。

有人会说，办个玻璃厂有什么稀奇的，但要是到这里来看一看，听一听，就觉得不一般了：这里属大凉山区，交通闭塞，当年红军来到这里时，不少老百姓还用着木碗，普遍用上陶器，已是解放后的事了。而“器皿”这个词，还是前些年会理人出去参观后带回山里的。这个美术玻璃厂靠几个技术人员日夜攻关，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工厂就生产出优质产品，走向了市场。他们生产的套料自然景观玻璃器皿，现已成为全国争相求购的产品。据介绍，套料自然景观玻璃器皿共有酒具、冷饮瓶、花瓶、旅行杯等18个花色品种。走进该厂车间，就如同走进艺术宫殿，每件产品都是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图案各不相同，有的浓墨重彩，似层林暮霭；有的轻描淡写，似行云流水，皆如一幅幅山水画。我了解到，该厂产品于1983年7月开始研制，同年12月通过技术鉴定，随即批量生产，投入市场。去年11月，荣获省优质产品奖和省优秀内销工艺品金质奖。

世代代守在江边大山里的会理人，一旦开了眼界，聪明才智就会奔涌出来，就能把泥土变金子。我在这个厂看到二百多种玻璃器皿，其中彩色玻璃器皿都是采用金沙江畔不同颜色的原料，经过处理，按不同的层次置于半成品表面，再进行吹制而成的。

再说一说会理的小吃：我过去总以为到过成都，见过四川小吃的世面，